党风党纪

毛泽东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思想

除了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科学的理论指导、先进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群众基础外，马列主义政党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和标志，那就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和严肃的党内生活。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

□ 戚义明

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科学的理论指导、先进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群众基础外，马列主义政党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和标志，那就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和严肃的党内生活。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之上，逐步确立起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

率先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命题。在土地革命时期，如何将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来源的党，建设成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党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无原则的批评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红四军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首先，要对党员进行充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党员的思想政治化，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使党员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方法，重视调查研究，避免陷入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条件。再次，要进行正确的批评，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保证和关键。针对党内无原则的批评和斗争，毛泽东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率先提出“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命题。我国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长期占优势的国家，这种社会环境反映到党内就导致民主生活不足。在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党面临着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发挥各级领导机关、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在此情势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突出强调党内民主问题。他指出：“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明确提出“四个服从”的完整表述。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原则是“四个服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率先提出了“四个服从”的完整表述。鉴于张国焘不遵守党的纪律，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军阀主义行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并归纳了党的“四个服从”的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他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入党章，但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别。

明确提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内涵。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组织原则，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在1938年10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又指出，党内民主“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不能“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党的七大开始，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被写入党章。

确立了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方针。在我们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和斗争中，土地革命时期曾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全面抗战初期又曾出现自由主义的错误。这两种思想和做法都是不对的，都是对党的团结统一和党的事业有害的。在领导延安整风过程中，毛泽东鲜明提出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针。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以便使后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所谓治病救人，就是对错误的揭发和批判是为了救人，为了帮助人教育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为了“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确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武器。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对正确开展党内批评、防止批评庸俗化的问题进行过充分阐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突出强调自我批评的问题。他指出：自我批评就好像我们“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认为，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展开“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也是延安整风之所以取得很大成效的原因。

领导延安整风形成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1942年至1945年进行的延安整风是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次生动实践。我们党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运用“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着力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经过延安整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巩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得到确立，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团结统一得到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逐步形成。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又突出强调加强纪律性，提出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等，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规范。

提出努力造成“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造成“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20世纪60年代初，他强调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不能搞个人独断，否则有“霸王别姬”的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好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从1957年开始，党内政治生活逐渐变得不正常；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更是遭到严重破坏，党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侵蚀。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和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开启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新局面。

英勇的湘江之战

□ 李东朗

发生在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大、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它是红军将士英勇血战的英雄篇章，影响深远，教训深刻。



蒋介石在湘江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中旬，实施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利用和粤军陈济棠达成的“借道”协议与蒋介石部署围堵的国民党军不到位的空隙，相继突破了国民党在江西、广东、湖南等地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向既定目的地湘西前进。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初，蒋介石搞不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举措犹疑，但在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前，他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是“仍取肖党旧径”，即循肖克率领红八军团西征路线前往湘西与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湘、漓水以东地区。”为此，他部署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的兵力，配备空军实施侦察和轰炸，利用宽阔的湘江“天堑”构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一举将红军歼灭。由此，在中央红军周围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左有粤军数万人布防在连州、星子一带；右有薛岳率“中央军”五个师正向零陵与红军作平行前进；前有湘江，已被湘、桂军阀近十个师封锁；后有周浑元“中央军”四个师，湘军李云杰两个师、李韫珩一个师追击。征程中的中央红军面临非常严峻的军事形势。

“大搬家”错失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有利时机

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11月22日先头部队长途奔袭占领潇水西岸的最大渡口——道县，24日又攻克江华水口圩。25日，中央红军大部从湘南道县与水口间渡过潇水。

蒋介石在潇水“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后，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已过潇水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潇水的红军余部进行堵截，务必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11月2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从湘南强渡湘江、进军桂东北的作战命令。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军委纵队和八、九军团随后，五军团后卫的态势向湘江前进。27日，两翼前锋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控制了从兴安的界首到全州的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打开了前进的通道。

但是，随行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缓慢的行军速度，严重影响了全军的突围的进程。其时，这两个纵队也已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离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八十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但是，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政府，以及各个群团、卫生、后勤等非战斗单位及人员组成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达14536人），同时携带了大量的物资，军工机器、各种器械，甚至印刷机、文件档案、家具以及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等，装了数千担，由5000多个挑夫挑着随行，因此行动非常迟缓。26日，中央军委纵队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一天之内只走了八公里；27日，从桂岩到文市，行程仅六公里；28日日，从文市到石塘，走了二十六公里；29日日，从石塘到界首，走了三十二公里。

“左”倾领导人在战略转移中实施“大搬家”，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性和突破国民党军重围的速度，丧失了以较小的损失渡过国民党湘江封锁线的良机。

湘江血战

把守湘江两岸的湘、桂军阀迫于蒋介石的命令，更重要的是出于保存地盘、防堵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其势力范围的目的，调集重兵疯狂进攻中央红军。湘军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占领全州，并南进向红军扑来，占领部分渡口封锁湘江；桂军以三师之众向红军左翼猛攻。同时，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已夺回道县，向红军后卫进行追击。为了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以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殿后，与进攻之敌展开殊死搏杀。这就是惨烈的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在11月28日打响，主要在灌阳新圩、兴安界首光华铺、全州觉山铺在三个战场展开。红一军团在觉山铺狙击湘军，血战两昼夜；三军团、五军团与向红军侧击的桂军在灌阳的文市、新圩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战况非常激烈，香港《循环日报》曾就此报道说：文市战斗之激烈程度，“为赤匪抵桂北以来所创举”；新圩“连日战事，异常剧烈，比之文市之役尤甚”。英勇的红军战士用单一、简陋的装备，用血肉之躯抵挡优势敌军的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和疯狂进攻，在坚决的阻击和反复的争夺中，争取和延长中央纵队的渡江时间。

激战至12月1日，敌人对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红军指战员遵照中革军委的作战命令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署下达的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前仆后继，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时间。后面的部队不顾饥饿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渡口。浮桥炸断了，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战士拉着接长的背包绳过江。大战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简短的评说

红军将士与优势之敌苦战五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取得了长征途中最关键战役的胜利。湘江战役充分展现了中央红军临难奋战、英勇威武的光辉形象。

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有6.4万余人，而在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5万人左右，而且主要的主力作战部队损失惨重。殿后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红八军团被打散了，最终撤销了建制。

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标志着“左”倾路线领导的破产。亲历者刘伯承就此回忆说：湘江战役几乎使红军濒于绝境，“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这为后来结束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提供了历史的条件。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正确对待进退留转

□ 陈海燕

今明两年，是全国省市县乡领导班子的集中换届年。换届对于很多领导干部来说，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进退留转，自然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笔者最近就接到在乡镇当副科级干部的同学的电话，交流中发现，年近40的这位副科级干部非常想提拔到某个正科级岗位上，一度他对自己的履历和能力非常有信心，认为县里对干部的考核连续三年他都是优秀，又立过一次三等功，主管领导对他也很信任，提拔正科应该没有问题。但结果公布出来，他还是落榜，感觉心里很不平衡，等到下次干部调整，又得到两年之后，而年龄增长，恐怕前途无望，一时非常迷茫。在集中换届的时候，像这位干部的遭遇和想法，恐怕不是孤例。换届中无论是有没有得到提拔，或是调整工作岗位，都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进退留转。

首先，对我们的干部工作要有信心。我们的干部工作有很好的传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对干部工作规律认识的深化，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导向性的做法，提振了干部的士气。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各级干部年龄普遍偏大问题，提出了干部“年轻化”原则；又如，为了在干部工作中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民主评议、民主推荐等环节作为考察工作的必经程序；再如，为了强化基层导向，提出注重发现和选拔具有基层领导和工作经历的优秀干部，尤其注意选拔在改革发展稳定一线和艰苦复杂环境经过扎实磨练的干部，等等。这些干部工作的做法和导向，总的趋向都是更加科学和民主地选拔那些适于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当然，对于一个组织来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选人用人问题，这是所有组织都反复面临的一大难题。尤其对有着88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选好人用好人，始终是一项需要不断改进的工作，但整体取向是日益合理化，既考虑组织发展的需要，又充分照顾到干部的成长规律。所以，对开头提到的那位没有得到提拔的干部来讲，不能因为一时埋没，就对党组织心生怨言，而应该比较一下，自己与那些得到提拔的干部相比，有哪些差距，他们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样，在下一轮的干部换届调整中，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其次，调整好心态，不能自乱方寸。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以他的天资和聪明，曾经两次参加会试都落榜，没有考中进士，直到第三次才考中。而他的父亲则是状元出身，可以想象，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但是面对两次落榜，王阳明的气魄却是“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别人都在以没有考中进士而羞耻，他却以没有考中就心慌意乱为羞耻。格局高下，一望可知。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以极大定力和智慧，在遭受廷杖之辱，被贬斥到当时的蛮荒之地——贵州龙场当一名小小的驿丞，依然没有消极颓唐，而是以此作为磨练身心的时机，叩问自己“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终于悟出格物致知之理，被称之为“龙场悟道”。经历过如许历练的王阳明，在悟道十年多之后，才能以一介文士，在短短的四十几天时间内就平定蓄谋已久的宁王之乱，将一场动摇国本的大祸消弭于萌芽状态中。当然，绝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成就王阳明那样的事功，但是他的精神很可学习。那就是处在微末的职位上，依然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有更高的人生格局和追求，从一个长时段来看，就有可能突破条件限制，取得一定成就。

再次，多学习多读书，开阔境界，不将人生成就高低标准等同于职位高低金钱多少。很多干部为什么在没有得到提拔的时候觉得迷茫甚至颓唐，不排除一些干部将人生成就的标准简单化为职位高低或者金钱多少。人生境界不开阔，行为就会趋于功利化。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几年前号召的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不失为一剂良药。中国古人讲，“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读书是人改变气质提升格局的一条大道。古来那些能看淡得失荣辱，从容面对进退留转的，都是在读书上深造有得，进而在修养上也有所成就的。我们那么多干部，真正能得到提拔重用的，仅是少数中的少数，对于大部分干部来讲，都可能要在普通职位上退休，这是一个现实。但是，这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个有修养有学识有爱心、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最后，组织上也要充分考虑干部的情况和诉求，通过更加多样化的方法来保证干部待遇、提振干部士气。正是因为绝大部分干部不会提拔到高的职位上来，所以，更不能简单用提拔的方式来提振干部士气。而应该考虑建立根据普通干部的年资和贡献来提高待遇的机制。去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历练与修养